

论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及其教育方式*

朱康有**

【摘要】与以往相比,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显得更为复杂化。话语方式是意识形态表达的重要载体。它取决于我们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共产党作为以追求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治党派,应当能够将价值与真理统一起来,超越利益的拘束,达到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标准。在此过程中,纯洁自身的意识,保持宽容的心态,坚持斗争的精神,就显得非常重要。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柔性”的特色。基于共性主体与社会不同主体状况,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在抽象、普遍的前提下,可以容纳多样个性的特色。同时,还可以吸纳更多的社会话语资源。这样,对年轻一代就会增强吸引力,使之更加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意识形态话语本身暗含各种层次的问题空间,实践层面的贯彻和落实将反过来极大地丰富话语体系,使之获得充实的内涵和外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大众的话语方式、学术界的话语方式,“目光向下”,适应并跟得上丰富多彩的对象维度。在意识形态的高等教育中,应改革模式化、框架化、条文化的话语表达,改变“一竿子插到底”“上下一般粗”的话语灌输模式,实施分层次、多样化的话语教育方式。此外,还要改变话语内容上部分不适合现时代的具体结论和命题,增加时代内容的特色和比重。

【关键词】意识形态; 话语表达; 个性特色; 问题意识; 教育方式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问的是:靠什么去争取人心呢?我想很简单:一靠真诚为群众服务;二靠真理的彻底性说服教育群众。前者关

* 本文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同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2015MZD044)子课题“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成果之一。

** 朱康有,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

涉实践层面，后者关涉理论层面。只说不干，能蒙蔽于一时，长期来看，必会因失信而适得其反。强调身教身行，行而不说，或行而后说，为中国一贯传统。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强化以后，在政府、政党的作为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如何去“说”的问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是强化了社会舆情、国家意识、世界舆论，借助于虚拟空间被瞬间放大的能量“翻江倒海”“众口铄金”——在真相到来之前，事实已经覆辙，进而导致“颜色革命”不是不可能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特别是其表达层面的“话语权”建设，是时代提出的紧迫任务；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建设离不开“丰富灵活的话语言说方式的形成”，应改善意识形态的“话语建设”^①。

一 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理念

“话语权”是近年来我国在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但其实它的产生早在国内就发端了。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宣传战线上的时代性、针对性、有效性，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很好地解决，相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日趋严重。跟不上时代步伐、没有针对性、时效性下降，不能说是整体上处于“失语”，但至少说明我们对内的话语体系不够健全。由于舆论工具掌握在我们党手中，对内话语即使有点问题，总体上还能基本掌控得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初期，对外交流的领域和深度还不是十分显著；近年来上亿人次的出国规模，加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央，而由内延伸出去的“话语”不断受到挤压，这促使我们反思自己：是自己说的内容不正确？还是表达方式出了差错？

“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都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②。尽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种倾向的谬误之处，但它确实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某方面特点。“话语权”背后的理念隐藏着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架构。引导人们坚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一个有待建设的目标。它汇聚众多差异、诸多层次而形成，并非单一之指向。有个发展学的理念叫“包容性增长”，用到这里非常合适。同时，也有一个来自最高层的说法，即通过求取“最大的公约数”来凝聚共识。我想，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它不仅符合社会发展的“力学”原则（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众多意志“合力”的结果），同时也极为适合当代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甚至多元价值的事实。我们强调“正能量”的引导力，却并不希望意识形态上僵化的再现——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苏联晚期都曾产生了国家精神的停滞带来生机几乎消亡的情形。

涉及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论题，有学者对此已经做过不少探讨。关键在于，能否

^① 李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第2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0页。

将意识形态的民族性、阶级性、价值性、利益性与合理性、合法性、真理性统一起来。“马克思把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置于全新的、科学的基础之上。”^①如果局限在一切剥削阶级和事实上的统治阶级，这一关键问题就不可能得以很好地解决或者被掩盖起来。纯粹的共产党人建立的意识形态，其彻底性毫无疑问地能够协调并解决这些对立的成分。而现实证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的过程体现，使处于某一特定国度、某一背景阶段、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不得不沾上各种“杂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②。理想的目标一旦被锁在“沉重的肉身”中，飞向天空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时时净化、纯化、强化目标的专一、境界的高远，对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建设来说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党对执政带来的危险做了多方面的阐述，从精神方面来讲，意识形态由“争取”向“辩护”转换蕴含的忧患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它象征着从“破”向“立”的思维路向改变。一般来说，“破”易“立”难。前者攻其一点，可带来阵地的全面破击；后者需要处处设防、时时维护，才能稳固江山。前者的“真枪实弹”可激起奋勇的精神，后者的“糖衣炮弹”则容易引起懈怠不振。“说话者”地位的改变，相应地，说话内容、表达方式、感情色彩等方面皆有变化。不变的只有一条：不管社会形势如何发展演变、内外环境如何改变，就像有的专家指出的，我们还能不能有原来那样的组织力、号召力，登高振臂一挥，能够一呼百应？

主张“观念统治世界”是以往一切唯心史观支配下的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不能不承认的是，一段时期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战线也说了一些空话、套话：看起来“无比正确”，却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当然，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不但承认了这些失误，也确实改善了不少。只是还有很多方面的“惯性”是那么强大，一时纠正起来并不容易。比如说，对典型的宣传，有人讲，西方的媒体甚至能将假的包装成真的，而我们则相反，经过有些媒体套路式的宣传，真的都变成了假的。对于党的有些理论和政策的贯彻，透过对相当一级的媒体的报道，让人觉得似乎经不起推敲：有时不但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适得其反。这里并不是要否认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在配合党和国家重大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整体上发挥的解析力、影响力，而是上述问题我们不能不正视。

“意识形态要在语言中寻找。意识形态的信息包含在潜在的结构之中，它隐藏于言语中，以至于说者和听者都或多或少难以获得。”^③简言之，我们似乎不会说“话”了，严重一点，甚至不会说普通人该说的“话”了。一些报纸杂志只会说别人说过的话、说上面说过的话，就是不会通过自己的头脑说自己的话。在意识形态

①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3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4页。

③ （英）大卫 《意识形态》，孙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92页。

宣传方面，读的一些文章、看的很多评议、听的很多报告，似曾相识、一个面孔，引不起大脑皮层的生理刺激，甚或让人心生厌情，遑论能够入情入理、入脑入心，达到说服、教育的目标。我们承认，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乃至强制力，但它依然是一种软性的力量。

“柔性”不是柔而无力的软弱。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方式的僵硬色彩，还体现在四平八稳、八面玲珑上，好像什么都说到了，也好像没有针对特定的人和事，结果失去了战斗的影响力。列宁曾经有《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①一文，他实际上也主要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着眼的。只要现代世界存在国家之间的斗争，存在错误思想和正确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就不能放下自己手中作为“笔”的武器。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非正义性作为和思潮，还是对来自内部社会的各种错误、偏颇做法和思潮，敢于直面问题，采取分析式的批评、批判本就是理论发展的合理途径。

战斗的情感并不排斥宽容的精神。政党产生于主义，主义规定了这一团体的宗旨、信仰和长远目标，战略、策略都会根据时代做相应的调整，唯独不同阶层团结起来的最终精神和行为支撑一般不会发生偏移。认定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如果朝暮变化，团体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失去核心的凝聚力。这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的最高层面反复强调“一元”指导的根本原因。但是，意识形态可以分成主流的、非主流的，精英的、大众的，对内的、对外的，浅表的、深层的等各种侧面，其他侧面并不一定构成对主流、一元的挑战，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丰富和补充、完善和调剂。允许对处于“经典”地位的指导思想作广义的推演，使之不断容纳新生的事物；允许社会各种积极的成分亦努力向“中心”靠拢，联系起来，获得合理化的生存。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像一篇鸿篇巨制，形散而神不散，既有活力的进发，又有灵魂无形的贯穿。

二 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个性特色

正统意识形态代表官方的统一意志，表现为政党团体的话语方式，如何说它可以获得“个性”的特色？

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一定要对青年一代富有号召力，毕竟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交到他们的手中。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持续不断地被灌入青年人的头脑。近些年来，高校“两课”面临的尴尬是该课程教育者有目共睹的。那些本来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浓缩我们这个伟大民族进步的历史过程，被简化为干巴巴的供背诵记忆的条文和一些原理，仿佛下一代死记硬背了这些“教条”，就为不可知的世界打开一扇智慧的窗户。过程的复杂性、探索的艰巨性、路程的曲折性、争论的矛盾性，统统隐藏起来，变成单一线索的叙事模式。我们太善

^①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22~331页。

于将一个个里程碑构造成为一个个纪念碑，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简单串联起来“织成”流水线的机械“工序”。启迪的智慧出于巨大阵痛的新生命的诞生，并不一定被描述在具足的逻辑合理性中。在这里，头脑极有可能被束缚在某个知识的框架里，精神的思维活动不再翱翔于蓝天而踟躇徘徊、停滞不前。靠什么来激起一辈辈潮涌似的后来者宏大的国家崇高感、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话语的枯竭意味着思想的枯竭。若本来即无深沉的思想、厚重的意识，何谈思想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本质内涵，就是话语主体通过话语载体有效地表达其话语内容。”^① 当与反映的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时，语言本身有可能变成众人心照不宣的“皇帝新衣”或者行动的“遮羞布”，渐渐脱离立足的大地，抽象为不知所云的空中楼阁。于是，台上台下的对立、言行不一的怪象、心口相违的忠诚就会蔓延到社会生活中。这是我们目前“两面人”产生的“富饶土壤”。“‘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②。人们交流的语言工具的各种组合本可以编织出五彩的世界，却与工商时代制造出来一件件相同的产品类似，不幸亦笼罩在很多单向度的复制品中。每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是那么个性十足，而在精神的大舞台上又似乎显示出无亮点乃至黯淡无光。难道说思想者的话语永远只能是披着一件灰色的“外衣”？

首先，话语的无力往往不是由其自身问题所造成的，恰恰最主要地表明实践指向的偏离。在儒家孔子阐明的“文”与“质”关系中，“文质彬彬”自然最佳，退而求其次，“质胜文”虽“野”却不失质朴。现在人们理解的“文明”内涵，更多地倾向于外在的“包装”，与《周易·明夷》彖辞中“内文明而外柔顺”讲的修身而道真的“内文明”有很大差异。在行动中没有按照所宣讲的去做和实施，知行没有合一，就会造成“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的状况，自然所言之语，轻飘无钩。无论意识形态的语言“装扮”是如何华丽在身，很难去感染随众。也就是说，行动自身便具有辩护的力量，它或许不需要堆砌许多高大上的语言表层，而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传唱于世人的口中。“真干”胜过一切空言，能够产生耀眼的辩证理性智慧。实践的“曲成”，在细节上将极大丰富“文”的通达影响，提升语言的渗透魅力，展现话语者的体悟个性。故此，实践的成就，不只是数字的增长，还标志着能够讲出各式各样的新鲜故事来。

其次，力图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可以用多种多样的客体形式间接地体现出来。大众传媒既张扬了形形色色主体性存在，同时也使意识形态的话语控制力有所加强。比如，很多人知道好莱坞和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活跃于荧幕前台的是影星，但他们塑造的形象代表的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价值理念。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① 田长生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方法探析》，《党史文苑》2017年第7期下半月。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3页。

间接表达。好莱坞塑造的主要是史泰龙、施瓦辛格、布鲁斯威利斯等英雄形象，而不是我们影视界推崇的一些不男不女、不伦不类的“搞笑者”。在市场经济中，一反原来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走向另一个极端，重视“笑料”的堆积、娱乐的功能，又忽略了对青年一代的正向引导和影响。文化产业是一种“新意识形态”^①，娱乐的文化形态，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满足差异的同时，亦可能造就宏大叙事式理论的解构。思想宣传战线上的舆论工具，除了正确传送和解读上级精神之外，奉“守土有责”的职能，对此现象不能闭眼不管，听之任之。误导价值观的企图，往往隐藏在不经意的一个小故事、不起眼的小评论的叠加中。此外，所谓“间接”表达，应当巧妙为之。庞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操作层面的贯彻则需要层层转换。不能满足于照本宣科的传达和学习，那样只能把很多人变成思想的“复印机”和“缩微版”的意识形态“全息细胞”，造就一批夸夸其谈者。现代社会分工精细，只要能够了解本领域的详细状况已经是非常了得，换言之，在本职工作上做精益求精的专家和行家里手，并非仅仅是一些我们过去称为“只顾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方向”的人，或许他们才是真正使意识形态能够“落地”者。

再次，话语的主体性是其自身获取个性丰富的源泉。在社会交流中，话语的特性是区分每个个体独有色彩的最重要表征之一。除了内涵的深度、外延的广度，话语背后隐含的情感、态度、口气以及音质、节奏等细微处，据此即可完全识别主体的身份和面貌。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基于政治和话语权力的架构，总是趋于质的单一，以至于根本无法辨别是一个领导人在说话，还是一个平头百姓在说话，从而失去了主体性、抽掉了个性。没有个性的在场，就没有新颖性，全社会就很难真正调动起创新的积极性氛围。这种做法误以为，只要大家说同样的话，就是“听话”，就能做到一致性。其实，公共的意识形态话语需要不同社会主体的“分担”和“解析”，才能最终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运行中扎下根。各个组织阶层、不同行为者可能所“言”不一，但同样都是为围绕意识形态提出的核心目标而努力。试图让众者说同样的话，表面看起来达到了思想统一，做起来仍然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有所取舍，并极易变成阳奉阴违。要避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作为“虚假观念”“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②，使之能和广大群众的切身经验联系起来。为此，必须使比较抽象的普遍要求和理想目标更加具体化，亦才转变为可操作的特殊性。简言之，意识形态话语一旦获得个性的特征，能够使其脱离因抽象、普遍而带来的“架空”危险。我们既要重视意识形态话语对动员社会积极创新的一面，同时也不应忽视基于某些“表态”上的言不由衷而带来的谨小慎微，进而造成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① (英) 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铨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1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9页。

最后，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应该吸收社会资源，特别应当关注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借他山之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话语系统被一些人划分为政治权威的话语、理论学术界的话语、大众百姓的话语等“圈子”，它们之间少有互动，有的“圈子”压根就不知道另外一个“圈子”在说什么，“圈子”与“圈子”甚至互相看不惯、瞧不起。相对的距离是需要的，但绝对的隔离则并不符合信息开放的时代要求。要“在话语形式上，变学术话语为生活话语，变官方话语为民间话语，解决‘怎么说’的问题”^①。仅仅站在“唯我独尊”的角度，就会将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对立起来，进而把自身封闭起来，难免成为孤掌难鸣者。把“指导”实质理解为“替代”，指手画脚具体学科领域，乱扣帽子，造成了有些学者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除了杰出领袖的功绩，还有理论界的广泛参与。那些饱含时代高度和深度的理论研究成果，其语言表达同样丰富了时代的词汇和范畴。摘掉有色的“眼镜”，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能有效针砭意识形态话语的贫乏和空泛。

三 话语暗含的问题意识及其解决

意识形态话语并不仅仅是一种软性的强制要求，它同时针对某个阶段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为此，受众不能单纯将之理解为无条件地去执行和贯彻，因为问题没有细化之前，观点没有被精致分析之后，是无法得以操作的，所谓的“执行和贯彻”只是口号中、宣传上的，远未进入实践的环节。

政治机构的决议、各级干部的讲话等更多地只是提出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方向，或者解决问题需要坚持的观点和理念，而决策和实施往往有赖于方方面面具体去研究和部署。其间应该预留认知和回味的时间和空间。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意识形态部门倾向于运用庞大的宣传系统在“第一时间”开动所有的马力，甚至有些部门还不惜打断其正常运行的节奏、推行精神的传达。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在民众中播下了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乃至怀疑、抵触的种子，进而造成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字里行间处处都包含有待各行业解决的“疑难杂症”，这些决定、决议你只要去认真追寻，亦可延伸出层层无穷尽的问题空间。不是要所有的对象关注所有的问题，对相关领域面上的了解非常必要，但重点是关注自己熟知和从事的领域，集智攻关特定的问题。也许你对报告和讲话的整体不是十分清楚，或许出于专业的制约，你仅仅了解某个部分；极端地讲，你只是对某一个话语中包含的思想、举措十分感兴趣，并能持续探索，直至深度地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刻行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微观地看，

^① 孙照红 《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与构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星星点点，最后却成就了整体的全局，灵活地使无形的意识形态大网“兑换为”生产生活的实际、精神活动的依赖。尽量避免所用的一些话语使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无感。问题是时代呼唤需要给予回答的“钥匙”，质疑非同“找茬”，恰恰乃引领前行的号角。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①他把问题等同于一个个需要解决的矛盾，非常具有先见之明。毫无变通地机械搬用、不折不扣地僵化应用，遮蔽了大量的棘手矛盾，回避了严峻的现实问题。结果一朝暴露出来的“疑难杂症”，显现背后为长期的积重难返。教条主义的某些影响深入骨髓。追求“掌声”和“鲜花”偏向的效应，已经使部分人不去用心面向深刻的问题去思考对策，习惯于听闻歌声海洋带来的溢美之词。固然有意识形态话语的隐晦和“外交式”表达的不当，没有问题针对性的回答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趋向。“维稳式”的方法，映现出某些社会问题确已到了该解决的“临界域”，亦证实我们的说服、劝服不总是有效的。从暴露的一些极端个案事件看，不下决心解决“病瘤”，搪塞式的辩解可能真使其体形越来越庞大，直至一天侵害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即使扁鹊在世亦“望而还走”。不能满足于和陶醉在巨大的成就中，更不能沉浸在物质便利和权力欲望支配的享受中。清醒的忧患头脑应唤起民众冷静地应对一个风险社会的到来，始终关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前车之鉴，为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深谋远虑。

话语承传文化文明，能否理解、接受、认同，考验其有效性程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要想在社会上得到实施，“单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是不够的，单纯依靠立法使其在文本意义上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一个合法性即得到老百姓从内心接受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活动”^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应当一定程度上适应大众的话语方式、学术界的话语方式，不能牢牢封闭在自我的视域中而高高在上。虽然我们无法消除“自上而下”的痕迹，而商议式的平等对话方式更能直指人心却是周知的。问题的解决一定是生动活泼、创新性的，绝不只是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从学习到学习、从文章到文章。话语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能不能讲话、允许不允许讲话、讲什么样的话、在多大范围讲话，皆彰显、代表讲话者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话语的铺天盖地，有时会障蔽某些有价值思想并使之沉默无语。话语的践行，超出了文字本身的内在意蕴，转变成行为的外显言语方式，非语词符号所能尽义。它充实、完善了话语的内涵和外延。那些还没有“开始”，就有了总结性成果的“结尾”，实际上否定了这种实践的转化过程。阶段的稳定性，使基于政治架构基础上的话语相对滞后于日新月异的形色世界。在形下分解和主体性诠释中，意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9页。

^② 赵继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46页。

形态话语的表达如何“目光向下”，适应并跟得上丰富多彩的对象维度，始终是一个待解的重大课题。

四 意识形态话语的教育方式

“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它的形成在阶级社会中是以‘精神生产’的面目出现的，并且一旦形成后，便立即承担起调节该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作用”，因此，“向其社会成员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成为必要^①。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几十年来无疑属于严肃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我们的这种意识形态灌输遇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冲击是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累积起来的巨大反差，从而造成了教条式的外在灌输教育方法很难入心入脑。不正视这种冲击，我们就会失去青年、失去未来，将可能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僵硬局面。增强意识形态教育上相当程度的弹性，就可以在宽容中调节气氛，增强活力，锻炼思维，从而改变浓厚的辩护色彩、说教风格。这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为例^②。

首先，改革模式化、框架化、条文化的话语表达方式，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智慧影响世界的功能。哲学自古至今一直被认为是开启“智慧”的化身，对于启发思维，增强思维的深度、高度和宽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把学习以往的哲学看作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的途径。但是，无论是从具体的思维材料上升为世界观，还是由抽象的世界观层面下降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往往要通过许多难以逻辑表述清楚的中间环节。哲学发挥的功能历来是潜在的哲理启发，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在理论灌输中，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为了完成学业，则把哲学的教学活动变成了单调的知识传授和记忆。这就大大简化了对哲学功能发挥复杂性的认识。人们把哲学当作是其他学科一样，认为拿来即可用。在说明实际社会生活时，哲学成了“灵丹妙药”，熟悉哲学作业和考试方式的同学，甚至能运用市场上总结出来的图解方式，“套用”原理，以不变应万变解释现象。本来最抽象、最远离现实生活的哲学，现在被迫成为功利化的附属。如此而言，外在的原则摇身变成为束缚人的大脑的“紧箍咒”。哲学原有的爱智慧、开智慧功能走向了它的反面。实质上，哲学智慧对具体科学和思维方法的“指导”，不应当被庸俗化为实用主义的“变戏法”。为此，还原哲学表达上的隐喻化、多义化非常必要。哲学从来不是“1+1”的确实性知识，那样只会把人们的思维凝固化，制约民族的创新力。哲学语言丰富多义的弹性，加之以抽象性、综合性，可与其他观念相互影响，相互激荡，通过延伸、类比、缩影、充实以及诱导、暗示、规范等方式获得不同的衍生意义

① 杨生平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42页。

② 参见吴文新、朱康有 《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转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0期。

义，具有促进和牵引新思想发生发展的功能，可参与承受和潜入不同的思想体系。真正的哲学能使人放下思维的“汲桶”，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智慧的营养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大师们以“批判”为思想的锋芒，展开自己的聪明睿智，在激烈的精神世界“对决”中激扬思维的火花，留给我们一份极为丰富、发人心智的理论思维遗产。不幸的是，“教科书”化的体系留下干巴巴的“原理和原则”，失去批判功能的论证意味则在某种意义上窒息了这种作用的发挥。虽然文理结构清晰，逻辑顺畅自洽，但思维似乎停滞不前。一个个结论似的规律、范畴，恰恰背离了哲学智慧内在牵引心智的特性。也许什么时候能够躲避外在世界的“喧嚣”，哲学才能宁静致远。

其次，改变哲学意识形态“一竿子插到底”“上下一概粗”的话语灌输模式，实施分层次、多样化教育方式。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主流的话语方式，在维护社会存在和现有体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和论证又是必要的，然而，用什么样的形式去把它体现出来（不是直白地宣扬）则是另外一回事。正统自居、强力灌输，形式化推广、套路化运作、功利化宣传，文件式传达、会议式贯彻、口号式行进，往往引起年轻一代的嘲讽、反感。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效果可能并不佳。其实，在市场化的经济社会中，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思想多样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逼迫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容纳更多的有益成分。由于言与行、说与做某种程度的分离、冲突，已经造成了部分人群信仰的缺失和扭曲，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显然，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缺乏一种弹性和活力。尤其是对领导阶层、知识教育阶层和基层群众用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式进行教育，是不大妥当的。“意识形态的各种类型之间是存在层次差别的”^①。我们感到，在国家意识形态到基层群众的执行中，缺乏过渡性环节，以至于基层或者无所适从，或者简单对接。因此，因材施教、分层设教就显得非常必要。

意识形态的教育在基层应落实到具体可操作的层面。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来说，除了上述启发心智的功能之外，一个青年学生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做一个好公民，为国家和民族的建设贡献力量。当然，市场经济一方面使学生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一开始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定位自己的发展前景，尤其是立足和谋生的现实困扰着大多数刚走出校门、怀有理想的学生。踏入现实后，往往在学校里、书本上接受的思想教育，和严酷的环境对不上茬、接不上口。而市场负面效应趁势进入精神，瓦解纯净心灵。我们思想教育是否缺了点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实际上，就应付复杂的社会生活而言，任何单纯的意识形态教育也不能包打天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内容，更多地关注了客观规律、关注了群体意识、关注了一般，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个体内在的心灵世界、道德修养等方面缺乏精微展开的理论叙说。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

^① 刘少杰 《意识形态层次类型的生成及其变迁》，《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

之后的现代西方人文思潮关注的重点，也是以生死问题为核心的东方哲学两千年来探讨的重点。如果我们吸收其中合理的内容，从个体的精神生活和做人做事讲起，最后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内容之中，似乎更能切合人心的可接受性。“大学德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一定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①。实际上，高校学生的这种渴望，就集中在怎么样正确处理我们和自己、和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这种渴望，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教育内容的困乏和无力。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必要补充这方面的内容——高校应该走在社会的前列，从而发挥出强大的育人功能。

最后，改变话语内容上部分不适合现时代的具体结论和命题，增加时代内容的特色和比重。我们必须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逻辑连贯性，因为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规律，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思想的大部分，都诞生在阶级斗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与当今发展的时代背景差异较大。文本中有关革命、阶级、暴力、斗争的观念，非常切合于战争与革命时期，在国内的建设、改革时期则显得有些生疏。以前总是寻章摘句式、语录式地引用和指导现实，逐渐显现出缺憾和不足。争论正在扩大，认识出现模糊，哪些可以保留，哪些需要修正，哪些需要新创，依然众说纷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但也必须注意这样的现象“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大学的课堂上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时隐时现；理论建构落后于实践发展需求，教科书编写又落后于理论界的共识；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理念、理论观念往往停留于口号层面，或被生硬地纳入教科书体系之中；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奉行说得越圆越好，越没有棱角越完善，在理论内部绕圈子，“车轱辘话”翻来覆去，“新锅炒陈饭”，云里雾里，看似全面，实则不着边际、笼统空洞、虚而无用，“空转”了教育对象的头脑。更可甚者，患得患失，任由利益“绑架”了思维，“屁股”决定了脑袋。有多少我们称为“理论创新成果”却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创新能力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同样也是影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的重要因素。很多人力、精力被浪费在制造一些精神世界的“低端产品”，缺乏高、精、尖的“拳头”产品。

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亦是第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践行者。能否看准潮流，能否把握大局，能否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理论素养、学术功底。自我理解不清，研究不透，就很肤浅；浮在面上，理论很难深入进去，就说服不了广大学生。心气浮躁，东抄一段、西接一段，在网上拼一拼，找报纸凑一凑，现炒现卖，充斥假、大、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缺少广泛的影响力，引不起学生兴趣。这个问题说严重点，是理论风气不

^① 朱康有 《关于国学与高校德育的几个问题》，《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正,甚至是学术腐败的表现。因此,教育者的职业,不能仅仅把它当作饭碗,否则可真是“毁”人不倦。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就像做饭、做菜给我们的学生吃。既要有好“营养”(好的内容),又要有好的“味道”(好的形式),不下功夫是不行的——实际上这也就是“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亲身在课堂上和学生进行交流,最能深切体会教育是否达到了效果。要想说服别人,得先说服自己。只从灌输知识的角度施教,就很难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因为熏陶和感染,除了语言的力量,还有内在信仰的支撑。

Research on Expression and Educational Method of Ideology

Zhu Kangyou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y is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mode of discours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deological expression,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ideology we construct. Th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political party that pursues communism, should be able to unify value and truth, surpass the restriction of interests, and reach scientific standards in the expression of ideology. In the proces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aintain self-consciousness, mentality of tolerance, and the fighting spirit.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society, the expression of ideology should accommo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e personal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abstract and universal.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also absorb more social discourse resources, which will enhance its attractiveness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make them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Ideological discourse itself implies problems at various levels. The implementation in practice will greatly enrich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enhance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iscours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should adapt to the discourse mode of the public, the discourse mode of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 variety of social objec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ideology, there is a need to reverse the tendency of stereotype and doctrine expressions and atta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discourse mode. In addi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delete the content of discourse which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situations and propositions of the modern era, and add the content which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imes.

Keywords: Ideology; Discourse Mod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ssue Consciousness; Educational Method